



鲁迅思想论集

袁良骏

鲁迅思想论集

袁良骏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1/2 字数 150,000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072·659

每册：0.45元

前 记

当这本小书就要问世的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下面这段话：“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①这里谈的是创作，但我觉得也很适用于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鲁迅先生的著述卷帙浩繁，鲁迅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鲁迅先生是巍峨的高山，浩瀚的大海，我们也很难“表现他的全盘”，而只能“表现它的一角”。特别象我这样才疏学浅、缺乏根柢的人，至今所得的恐怕只是极其微薄的一点一滴。我之所以有勇气敢将这极不成熟的果实公之于众，归根结蒂还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的鼓励。假如说，我们整个的鲁迅研究、整个的学术事业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那末，我就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这“巨大的建筑”的“一木一石”。是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

收在本书中的十三篇论文，都只能说是习作。如果稍加分析，则不难看出：第一篇旨在揭露“四人帮”假借鲁迅的名义进行的篡党夺权罪行，二、三、四、五篇主要是对鲁迅

^① 1935年6月29日《致赖少麒》，《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38页。

思想发展道路问题的正面探讨，六、七、八三篇是对鲁迅思想研究中一些带有倾向性问题的驳诘辩难，最后五篇则试图从几个不同的侧面阐发鲁迅先生的光辉思想。其中二、三两部分酝酿时间稍为长一些，但就其粗糙程度而言，与其他各篇实在没有多大的差别。

本书有些篇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虽则都做了较大的改动，但恐怕仍有很多欠妥与错误之处。迫切希望读到本书的同志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本书有些篇在写作过程中曾分别得到周扬、李何林、唐棣、王瑶等前辈同志的指点和教正，谨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目 录

驳“鲁迅批判民主派”	(1)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	(8)
论鲁迅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28)
读《而已集》	
——兼谈鲁迅世界观的转变问题	(53)
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评价问题	(80)
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	(98)
研究鲁迅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论	
——兼评一篇关于鲁迅前期思想的论文	(117)
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42)
论鲁迅文艺思想的辩证法	(155)
论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	(186)
知识是力量，不是罪恶	
——学习鲁迅论知识	(199)
鲁迅谈读书	(210)
学鲁迅的榜样，做人民的“牛”	(220)

驳“鲁迅批判民主派”

“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是“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抛出的反动政治纲领。显然，“四人帮”把老干部与民主派等同起来，是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扫清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制造借口。基于这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四人帮”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捏造了“鲁迅批判民主派”的谎言。就在“四人帮”授意发表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黑文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立即指令亲信寻找所谓鲁迅批判“民主派”的语录。接着，他们御用的写作班子石一歌，便在《学习与批判》上接连抛出两篇大谈所谓鲁迅批判“民主派”的文章。石一歌摆出鲁迅研究权威的架式，煞有介事地大讲鲁迅当年如何批判“同路人”、“民主派”，似乎鲁迅早就是他们抓所谓“民主派”的“同道”了！“四人帮”及其喽罗这样居心险恶地盗用鲁迅的名义进行反革命的政治勾当，其伎俩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鲁迅在文化战线进行战斗的年代，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那时，正象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一个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参加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人，除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外，当

然也有大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只要这些人赞成、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都是无产阶级的战友和同盟军，无产阶级对他们不仅要竭诚欢迎，而且要热情地帮助他们前进。不如此，便无法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深知这一点。他对那些赴汤蹈火、英勇无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战友，从未因为他们的思想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排斥或歧视他们。相反，对于那些混淆革命阶段、歪曲革命性质、不要革命同盟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鲁迅才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那末，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批评吗？当然不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为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有一个必须帮助同盟者，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同盟者的任务。鲁迅正是这样做的，因为批评也是帮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批评和改造的，主要的是他们那种不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动摇性和两面性，亦即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不彻底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对那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是作过很多批评的。至于那些动不动就“走出阵线之外”，投降、变节甚至出卖革命的叛徒以及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内奸、“蛀虫”，诸如狄克、姚蓬子之流，鲁迅则是愤然斥责，无情鞭笞的。决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这些人类渣滓混为一谈。

当然，除了批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妥协性、动摇

性、软弱性和两面性之外，鲁迅也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又愿意前进的战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殷切的希望，反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投身实际斗争、走向人民大众的重要性。

凡此种种，是否就是“四人帮”所谓的“鲁迅批判民主派”呢？当然不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确实有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而前进。对这种人，毫无疑问是需要批评教育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四人帮”所要打倒的恰恰不是这种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顶大帽子，作为迫害不肯向他们卖身投靠的老干部的口实，至于极少数象马天水那样出卖灵魂的老干部，他们却视若珍宝，“民主派”的大帽子当然戴不到这些人头上。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别有用心地把“同路人”和民主派、老干部等同起来，又歪曲鲁迅批判“同路人”的原意，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徒劳的。

关于“同路人”，鲁迅有过明确的定义。他说：

“‘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①

鲁迅还指出，“同路人”原来是特指一九二〇年左右在

^① 《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32页（一九五八年版，下同）。

苏联出现的一个“非苏维埃文学”的文学团体。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公然宣称：“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这样的“同路人”，跟我们的那些在民主革命中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前进的广大老干部，显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把这些久经锻炼的老干部，看成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怎么能够说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来对他们进行丑化和诬蔑呢？

尤为恶劣的是，“四人帮”违背鲁迅的原意，硬是把“同路人”和内奸、“蛀虫”等同起来。在鲁迅著作中，内奸、“蛀虫”一般是指那些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而且一直认为这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对“同路人”，鲁迅则一贯主张团结合作，一道前进。当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之流诬蔑左翼作家不要“同路人”时，鲁迅曾经严正驳斥道：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①

“四人帮”闭眼不顾鲁迅的这些论述，蛮横地把“同路人”和内奸、“蛀虫”划上等号，然后再往鲁迅身上栽赃，其手段之卑劣简直无以复加！

“四人帮”还抓住鲁迅下面这段话大做文章：

^①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35—336页。

“……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①

鲁迅这段论述，是完全符合苏联“同路人”的情况的。“同路人”的那些作家，后来有的走上了反动道路，但也有的成了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如列宁曾经称赞过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然而经“四人帮”一篡改，鲁迅说的“离合变化”就只剩下变坏的一种意思，根本不存在变好的可能了。难道“四人帮”真不懂得“离合变化”的真意吗？当然不是！他们之所以要故意曲解，正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卑鄙目的决定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他们的罪恶用心就更加暴露无遗了。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刚刚逝世，石一歌就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了《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这株大毒草，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满纸都是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最凶恶、最危险的‘蛀虫’”之类的恶毒影射。值得注意的是，石一歌的这篇黑文，比起梁效的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大毒草，还要早出笼半月之久！要说这两篇黑文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色信号弹，不是十分恰当吗？！

为了把“老干部都是一时同道的伴侣”这样的私货硬塞

① 《〈十月〉后记》，《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第十八卷第257页。

给鲁迅，石一歌竟然这样写道：“鲁迅对这号‘同路人’是警惕的。他深切地感到他们‘容易变’，以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许多事都会‘败在他们的手里’……”粗心的读者很容易被石一歌这些“鲁迅里手”唬住，以为他们真是在引证鲁迅的原话。可是，人们稍一留意，不对了，这些“吹鼓手”们的骗子嘴脸即时原形毕露。原来，这里的“容易变”和“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引自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讲话》，而“败在他们的手里”则引自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前者写于一九三〇年初，后者则写于一九三四年底；前者批评的是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后者揭露的则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时间、地点、对象、内容、性质全不一样。然而，一到石一歌笔下，这些区别却都化为乌有了。

无独有偶。在“四人帮”把持的另一个刊物上，在一篇貌似研究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的文章中，又出现了这样一段妙文：

“鲁迅从‘同路人’的堕落和叛变的事实中，认识到‘左翼’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他说，有些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实际上也‘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于是，他们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

这篇文章的作者很会移花接木。实际上，被他们引用的鲁迅

先生的“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的一段话，说的是进步文学社团“语丝社”中的一部分人；而把革命看作“争夺一把旧椅子”的则是指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这里鲁迅的原文是：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①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个主语对“四人帮”诬蔑、攻击老干部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于是就被他们一刀砍去，却将“语丝社”中的一部分人硬拉来顶替。这样，一条伪造的规律就俨然从鲁迅著作中找到了根据，就可以用来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了。究竟这是研究鲁迅还是丧心病狂地阉割、攻击鲁迅，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四人帮”对鲁迅的一切歪曲、诬蔑和篡改，今天都成了他们反动罪行的可耻记录，但这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和光辉。

（原载197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①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9页。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

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是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分歧。由于“五四”时期以至整个鲁迅前期的思想比较复杂，认识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是很自然的。前些年由于“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流毒所及，就使这个本来比较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形复杂起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鲁迅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还是“进化论”的发展观？这关系到如下一系列问题：鲁迅的早期（1898—1917）思想达到了什么高度？它和“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有什么必然联系？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对鲁迅的震动和影响？如何分析鲁迅当时对待马列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与“进化论”的发展观有哪些联系？有无质的区别？“进化论”的发展观在“五四”时期还有没有积极意义？它与鲁迅的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的称号是否水火不相容？还有，鲁迅有没有接受尼采哲学等唯心史观的某些影响？这些影响在“五四”时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要想科学地分析“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就必须对上述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首先，让我们对鲁迅的早期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鲁迅的早期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六年，这是鲁迅主张“科学救国”的阶段。他之所以要进仙台医科专门学校，正是为了用西洋的先进医学救治中国的“愚弱的国民”，使中国人民摆脱“东亚病夫”的恶谥，并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这一时期，他所写的《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科学论文，目的也在于阐发“科学救国”的思想。从一九〇六年弃医就文，离开仙台医专，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是鲁迅积极主张“文艺救国”的阶段。正象鲁迅后来的《呐喊·自序》所表述的那样，当时他痛切地认识到光有强壮的国民无法使国家强盛起来，只有使他们从精神上觉醒起来，才能成为民族解放的雄伟力量。“医学救国”的理想幻灭了。这一时期鲁迅追求的是“精神界之战士”。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大踏步地走上了中国文坛，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精神界之战士”。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的早期思想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沉思默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阶段。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供职，业余时间则大量涉猎经史子集，佛经，道藏以及金石拓片等“古文明”。表面看来，鲁迅沉寂了，但他的内心却是火一样的炽热，他在焦急地期待着新的革命暴风雨的到来。不难看出，无论哪个阶段，鲁迅的早期思想都呈现着复杂的状况。

从政治上看，鲁迅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鲁迅已经从一个壮怀激烈的爱国者成为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辛亥革命之后，他很快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失败，看到了那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的妥协、动摇以及他们与封建复辟势力的同流合污。这时的鲁迅虽然思想上极为痛苦，但却并不消沉。他从痛苦中抬起头来，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努力寻求着新的革命道路和新的革命力量。这个总结和寻求为他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历史观上说，当时的鲁迅还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唯心史观的羁绊，尼采、叔本华、斯蒂纳尔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鲁迅并非对这些西方哲学家顶礼膜拜，他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既有所择取，也有所批判。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庸众”，是活该受奴役的；而鲁迅则认为，广大中国人民只是暂时的落后和愚昧，要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只有他们觉悟起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这就说明，尽管当时鲁迅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跳出唯心史观的范畴，但却已经滋生了唯物史观的可贵因素。

就自然观来说，鲁迅明显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察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把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无限的物质发展序列。不过，鲁迅把达尔文“进化论”这种发展观点用之于观察社会问题，得出了“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过去”

的结论，却又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倾向。这种社会发展观对于揭露停滞、落后的封建社会、封建礼教自然不乏其积极意义；但是，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深入进行时，它便逐渐显露其历史局限而成为鲁迅前进中的拖累乃至桎梏。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回顾中，不难看出，鲁迅的早期思想不是划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他的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的社会观中的进步倾向也是和那些形而上学的偏颇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无视或夸大任何一个侧面、任何一个局部都可能导致对当时整个鲁迅思想的曲解。

那末，马列主义思想在当时对鲁迅有无影响呢？鲁迅在当时有没有接触马列主义呢？事实表明，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是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从他爱读并收藏的报刊上，可以看到不少对马列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文章。其中不仅有日文译介马列主义的文字，而且有梁启超、朱执信等人用汉语译介马列主义的文字。照理说，鲁迅对此是绝不会视而不见的。然而，当时的鲁迅只是把马列主义当成了五花八门的新兴社会思潮的一种，当时他既没有对马列主义有过明白的赞颂，也没有对马列主义有过明白的非议。正象当时许多出类拔萃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一样，虽然马列主义已经进入了视野，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它当成革命人民翻身解放的锐利武器。

二

“五四”时期鲁迅对待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态度究竟

如何呢？毛主席曾经说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这里的“先进分子”，就是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后来在革命的长期锻炼中成长为杰出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时期的鲁迅是不是这样的“先进分子”呢？他是不是已经“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了呢？

有这样一种意见：毛主席说过，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主将”和“旗手”；既然如此，毫无疑问，他当然就应该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就应该“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一句话，就应该是马列主义者。这种推断符合不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呢？不妨先看一看持这种论断的同志所依恃的一些主要论据。

一是所谓鲁迅讴歌了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之下的俄国人民。鲁迅有没有讴歌呢？有的。在《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和《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鲁迅把当时的俄国人民称之为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